

优秀知识分子的典范

——丁石孙教授

■ 石生明

在我读大学时，学生称老师为某某先生；我是丁石孙教授的老学生，所以我早已习惯叫他丁先生了。丁先生于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。1952年全国各大学院系调整，他调整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工作，1953年他已开始主讲《高等代数》这门重要的基础课程。他不但教学效果好，还关心学生；深得历届学生的尊敬爱戴和高度好评；他在科研上也很快崭露头角。人民日报1956年8月24日的一篇报道中国数学会当年论文宣读大会的文章中说：“许多年轻数学家在论文中，表现出突出的数学才能……，一些老数学家谈到几位年轻人……，认为这些年轻人是中国数学界十分可喜的成绩。”这几个年轻人中就有丁石孙教授。丁先生十分重视教学和教材建设，他参加主编的《高等代数》（前身是《高等代数简明教程》）和《代数学引论》都获得过国家级奖励，对我国代数教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1979年他由讲师破格提职，晋升为教授。1980年由数学系民主选举担任系主任，1981年被教育部评为博士生导师。

丁石孙教授在文革及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屡次受到冲击，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；但他仍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。丁石孙教授工

丁石孙与中国数学

作能力很强，发表个人观点、看法条理清楚，论证充分让人信服；他大局意识强、作风正派、为人清廉，深得校内外人士的钦佩和认可！1984年丁石孙教授经北京大学民主推荐、教育部委任，成为北京大学校长，担任校长五年多；在艰难的环境下，丁石孙教授为北京大学的建设与改革尽了最大的努力。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，庆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，江泽民总书记出席并做报告。此时，丁先生已卸任校长，调任民盟中央主席，他作为来宾参加庆典；当庆典主持人介绍丁先生时，全场立刻爆发雷鸣般的掌声，其热烈的程度和介绍江总书记的掌声差不多。这是北京大学师生对他当五年多校长的充分肯定，校庆期间季羨林教授曾经说：北京大学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，一位是被称为“北京大学之父”的蔡元培，另一位就是丁石孙教授。这是季羨林先生对丁石孙教授的高度评价！丁先生调到民盟中央后，历任民盟中央副主席、主席，并任全国政协常委；还连任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在参政议政上又做出重要贡献。丁先生在我国知识分子中确实称得上是德高望重，他是优秀知识分子的典范。

我是1954年成为丁先生学生的，我毕业后留校并成了他的同事。1986年我调离北京大学，但与丁先生仍常有联系。丁先生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退下来以后，我与他的另外几个学生，每年都要（经常是两次）去看望他，陪他聊天和谈天说地。如今，我已是他62年的老学生。记得1954年9月初的一个下午，我们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新入学的240名新生，集合坐在北京大学五四广场的一隅空地上，一位帅气的年轻教师召集我们开会，这次会上他宣布我们新生分为9个班；我当时分在9班，丁先生担任我们年级的班主任并兼任我们9班以及其它两个班的班主任。当时，丁先生还给我们讲了新生入学的一些注意事项。这就是丁先生第一次与我们见面的情形，此后开始了我们师生的真挚友情。

大学一年级时，丁先生为我们主讲《高等代数》课，他声音洪亮、条理清楚、叙述明晰；他很注意讲清楚思路，并善于让同学跟着他思路联想与思考，使大家易于接受内容中的难点。即使课上有些细节没有听明白，由于丁先生讲课思路清楚，课后经过复习我们都很容易搞懂。后来，我留校工作时，他对我说过：“备课，当然先要自己把内容搞清楚，但这还不够，还要搞清同学们会在哪些地方容易发生困难，并搞清楚怎样才能使学生易于接受。”他有规定的时间为同学答疑，丁先生认为亲自答疑能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，便于有针对性地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。他还给我们9班和1班上习题课，其方式是课上做4~5道题，做完一道再做一道，每做一道题时由一位同学上黑板去做，丁先生在旁边做些提示，以此作为全班的示范。全班同学做题时，丁先生在教室里巡视，并给做错的同学指出错误所在，对不会做的同学进行指导。丁先生经常要批改两个班的习题本，他批改得极其细致，不仅指出错误，还写出正确的做题方法。为了教好代数课，丁先生备课时，经常花些时间查阅相关物理、化学等书籍，寻找些例子说明代数在其它学科中的重要应用。当时，我们年级学生参差不齐，有些工农干同学基础较差，听课和做题都有困难，丁先生就加强对他们的辅导。个别特殊困难的同学，没有受到过中小学的系统数学训练，不仅数学问题不能理解，甚至连阅读教材都有困难。开始上代数课的一段时间里，丁先生每次上完课后，晚上把这些特殊困难的学生叫到自己的办公室，亲自领着他们念（像念语文课文一样）数学教材，一句一句讲解；经过几年努力，其中一部分同学赶了上来，有的同学后来在数学上也做出很好成绩。如张锦文同学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计算研究所研究数理逻辑理论，取得了一些成就。

对于年级中基础好的学生，系里也有特殊培养的途径。从二年级开始，系里组织了两个科学小组，由程民德先生和丁先生各指导一个组，分别找一些课外的文章，指导学生们阅读并相互报告；还找

优秀知识分子的典范——丁石孙教授 ■ 石生明

丁石孙与中国数学

来一些小题目让基础好的学生研究。这些同学中，有些特别努力，做出了一些小论文，培养了研究数学的初步能力。我学习上不善钻研，但丁先生觉得我还有潜力可挖掘，也将我吸收进了科学小组。我在丁先生指导下，读了“行列式的公理化”的内容并在全年级做过报告；虽然丁先生没要求我写小论文，但在科学小组中的训练使我的读书能力有了很大提高。

我们那时的考试也很有特色，是学习苏联搞“口试”。具体做法是老师先出20个考题（题目有一定综合性）写在纸上，学生一个个进指定考场考试；每个人从考题中抽签抽出一题，抽完题后准备十分钟，然后向老师报告这题如何做，并在黑板上完整地写出来。老师围绕考题的解题过程提出一些问题，其范围经常超出考题，进一步考查学生对有关概念的理解是否彻底清楚，有时老师甚至提出比考题更难一些的有关问题，测试学生是否有更高的能力；学生考试大约半小时，口试当然比笔试更容易了解学生掌握已学知识的程度和水平，但是却把老师们一个个地累苦了。如代数考试，全年级240人，主持考试的老师只有丁先生一个人，每天考八小时，丁先生要连续考16天，考完后丁先生累得病了一场。

丁先生当我们班主任时，有时要参加我们的班会，甚至一起和我们玩游戏和游览颐和园，真正与我们打成一片。有的同学有了思想问题和具体问题，也都愿意主动找丁先生谈心；甚至有的同学因恋爱问题找丁先生帮助，而那时丁先生自己都还没有结婚呢！可见，同学们都信任他。丁先生（还有同时教我们的程民德先生、江泽涵先生等老师）全心全意教学的精神和良好的教学效果，几十年来为同学们津津乐道和赞颂，丁先生的为人被大家敬重和爱戴就不足为奇了。丁先生和其他老师的工作精神，以及教学上的作法在我一生的教师生涯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；我始终以他们为榜样，学习他们的工作精神和教学经验，效仿他们在各教学环节上的成功作法，做出了一些成绩。现在

看来，丁先生在教学各环节上的作法（其他老师也有类似的作法）合起来就是教学上的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，完全能够和50年代纺织系统中的郝建秀操作法、60年代解放军训练中的郭兴福教学法相媲美，可以称之为北京大学特色的“数学基础课教学法”，它是那个时期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重视教学的良好传统的“产品”。我们年级在像丁先生一样的老师们的精心培养下，同学们打下了良好的学习基础和思想基础，出了大批人才，各自在不同岗位上有突出的表现，其中出现了七位中科院院士（其中两人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，一位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）。这都是丁先生和其他老师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，我们同学们也为受过这些高水平老师的培养而感到自豪。

丁先生很重视我国代数教材的建设，他为此做出了突出贡献。解放前，我国大学数学系都是使用外文教材。1952年全国各大学院系调整后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段学复教授领导的代数集体，除了短时间用过前苏联的教材外，开始自编《高等代数》教材。段学复教授、聂灵沼教授和丁先生在教学中边教边编写讲义，几经修改和试用，该教材于1964年出版了（时称《高等代数讲义》），这是教育部统一使用的教材之一。后来，毛主席提出教学要少而精，大学课程要砍三分之一；1965年底教育部重修教学大纲，并要重编教材，丁先生接受了写《高等代数简明教程》的任务；经过紧张而努力的工作后，该教材于1966年暑假按期出版。可是，此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学校停课十年，书没人用，后来连铅版都找不到了，丁先生连新书都没有看到；这件事让先生很伤心、很气愤，他为此书花了很大气力，结果这本教材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。1978年教育部又要重新修改《高等代数简明教程》，系里将这次任务交给了王萼芳教授和我，我们在丁先生的书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增补，最后以书名《高等代数》出版，作者署名是北京大学数学系代数小组，因丁先生的原书《高等代数简明教程》打得基础好，1978年此书出版后一直得到全国各大学数学系师生

优秀知识分子的典范——丁石孙教授 ■ 石生明

丁石孙与中国数学

的好评，并被大多数数学系采用为教材和参考书。目前，此书已修订到第四版，为我国数学教学起了巨大作用，曾获全国优秀教材奖和北京市科技进步著作类一等奖；丁先生为此书有重要贡献。

抽象代数是国外大学数学系又一门重要基础课。文革前，我国只有少数学校开这门课，已出版的教材中相关内容偏少。1978年北京大学数学系将抽象代数列为必修课，聂灵沼先生和丁石孙先生决定自编讲义。从1981年起，他们开始边讲课边编写，到1982年完成初稿；聂先生和丁先生各自教了两遍，每讲完一次修改一遍（1985年丁先生已上任北京大学校长，仍坚持讲完一遍和修改一遍）；以后我和丘维声教授也各讲了一遍，他们还吸收了我们的一些建议。书稿完成后定名为《代数学引论》。此书是聂、丁两位先生教学实践和教学经验的结晶，这本书“精心的选材，严谨的叙述，流畅的文字，适用于教学”的优点突出，使它获得了成功，对我们代数学教育影响巨大，并获得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的崇高荣誉。丁先生是对我国数学教育有很大贡献的人。

在我和丁先生长期交往中，深切感到他具有许多高尚的品质，他待人谦和、平易近人、作风清廉、为人正派、胸怀宽广、目光高远，我仅列举下面几件我直接接触和直接听丁先生讲的事。一件事是，他的小儿子丁干1985年考初中，差4分没考上北大一附中。一附中的校长请丁先生的邻居问他，愿不愿意让丁干上一附中，他自己不敢问，并知道丁先生很讨厌这种事。丁先生说，该多少分录取就多少分录取，结果丁干还是去了二附中。另一件事是，历来北京大学的新上任的校长都会由学校出面换大房子住，甚至换掉全套旧家具。丁先生原来住在北京大学中关园，但当了校长后他坚持不搬家，当时一家四口住在70平方米的房子中。后来，他的大儿子丁诵青结婚了，小夫妻各自住在自己单位的集体宿舍中，到了周末，同宿舍的人回家后，这小两口才能团聚，最后清华大学分房给丁诵青，他们小夫妻才

真正住到一起。如今，腐败盛行，贪官遍地，丁先生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来为自己谋取任何利益。他是一位高尚的人，还是一个有大局意识的人。1977年北京大学数学系揭批“四人帮”，丁先生被推举为领导小组副组长，其中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平反冤假错案，特别是为数学系前总支书记林建祥平反。因为当时还没有批判“两个凡是”，阻力很大。1956年以前，林建祥工作非常出色，数学力学系的工作在全校是数得着的，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执行得好。丁先生认为，要改变现在数学系的面貌，必须给林建祥平反，把他的问题搞清楚，让大家知道他当时做的是正确的，才会把大家的思想集中统一起来。丁先生提出不能简单地平反，更不是去整过去整人的干部，而是把1952年起林建祥在系里执行的政策在主要干部中讨论，大家一起来评论对不对。结果，不仅林建祥平了反，而且大家从思想上根本分清了是与非，拨乱反正，比较彻底地纠正了左的错误。事后我看到，十几年来批判林建祥的“积极分子”们的思想转过来了，全系人员的思想得到了统一，进一步证明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。

我是丁先生的62年的老学生，几十年来他给了我很多关心和支持。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讲《高等代数》，搞教学内容改革，我把行列式这部分内容换了一种讲法，想听听丁先生对这种改动的意见，于是就想请他听我讲一次课。但当时，丁先生已就任北京大学校长，不再具体搞教学，可他立即答应我。我讲课那天，丁先生准时来到教室，整整听了两节课，课后还和我交换了看法。另一次，大约1997年，我已调到首都师范大学工作，我想请丁先生给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讲讲他教学的经验，那时他已调离北京大学，到民盟中央担任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，已是高级领导人，他听了我的请求，也是立即答应。后来丁先生去首都师范大学为数学系教师讲了一个多小时，介绍他过去的教学经验和情景，与会的教师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听完他的报告。教师们特别感谢丁先生身居要职还能到基层来介绍教学经验。

优秀知识分子的典范——丁石孙教授 ■ 石生明

丁石孙与中国数学

这两次小小的活动，他这个“大官”不仅是为了满足我这个老学生的请求，而且更体现了他一贯支持教学工作的“初心”。

丁先生今年已90岁了，他不仅受到各方人士的敬重，还特别受到过去和现在北京大学学生的爱戴。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和力学系，丁先生教过的各届学生每次聚会，都会请他去参加聚会，以求再次聆听他的讲话。更加感人至深的是，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，发生了学生“争抢”丁校长的一幕感人场景，许多分配到各地的学生重新聚到一起，他们一个班一个班地“狂找”丁先生，请他与他们一起到新图书馆前合影留念、请他去班上坐坐，再为大家讲一课；丁先生常常是被架着一个班一个班走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丁先生也被深深感染。老校长受到学生们如此的爱戴，是丁先生的最高荣耀！！

（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）